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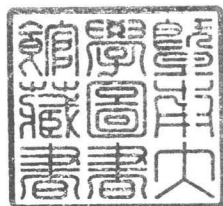
蘇加諾自傳

華人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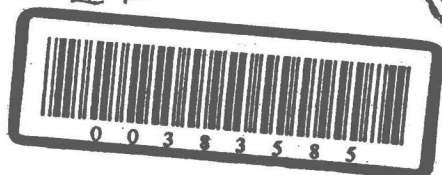
R822.4
2011

辛蒂·亞當斯
施永昌
柯榮欣
記述
譯

蘇加諾自傳



一九六六年，雅加達
亞貢山出版社



9310722

蘇加諾自傳

辛蒂・亞當斯 記述

施永昌 譯

柯榮欣

亞貢山出版社出版

雅加達 Kwitang 街十三號

一九六六年 第一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承印者：香港凸版印刷有限公司

目錄

一	寫這本書的動機	1
二	黎明的孩子	20
三	惹班：青年時代的苦痛	26
四	泗水：民族主義的熔爐	38
五	萬隆：前往白人世界的護照	60
六	瑪亨主義	72
七	印度尼西亞語	81
八	印度尼西亞民族黨成立	91
九	被捕	106
十	班最監獄	111
十一	受審	119
十二	蘇卡米斯金監獄	124
十三	釋放	133
十四	入獄	142
十五	放逐	145
十六	明古連	157

十七	逃走	170
十八	日本人來了	179
十九	日本人佔領時期	192
二十	是通敵者，還是英雄？	199
二十一	我的長子	210
二十二	自由的代價	213
二十三	最後一幕的開場	224
二十四	西貢會議	230
二十五	被擄	242
二十六	獨立宣言	249
二十七	起義	254
二十八	抗荷戰爭	269
二十九	邦加島	287
三十	生存鬥爭的年代	300
三十一	發展時期	312
三十二	蘇加諾對一些問題的看法	328
三十三	回顧	349

一 寫這本書的動機

對蘇加諾的描繪，最簡單的說法就是：是一個偉大的愛人。他熱愛他的祖國，他熱愛他的人民，他熱愛女人，他愛藝術，但更重要的是他熱愛自己。

蘇加諾是一個富於溫情而又非常敏感的人。他看見優美的景物，會深深地嘆息；他看見印度尼西亞的晚霞，心裏會受到詩意的震蕩。當他唱黑人的聖歌時，會潸然淚下。

關於我，曾經有人這樣說：「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總統太富有藝術家的性格。」然而我感謝萬能的真主。我與生俱來富於情感與欣賞力。不然，我怎能成爲一個像我一億零五百萬人民所稱呼那樣的「偉大革命領袖」呢？不然，我怎能領導我的民族從荷蘭三百五十年的統治下，奪回我們的獨立和天賦的權利呢？不然，我怎能進行一九四五年革命，並建立爪哇、巴厘、蘇門答臘、婆羅洲、香料羣島及荷屬東印度其他部分組成的統一的印度尼西亞呢？

革命的旋律就是破壞和建設。建設——需要一個建築師的心靈；而建築師的心靈，必須具備富於感情與欣賞力這兩個因素。領導革命的藝術，是在從你所看到的一切事物中尋取靈感。一個人怎能從事物中尋得靈感，如果他不是一个情感豐富的人，而且或多或少是一个藝術家呢？

然而，未必每個人都能贊同蘇加諾自己描繪的蘇加諾。他們不一定人人全都知道，要接近我的唯一的方法是打動我的心；他們不是全都知道，我其實像一個小孩，要是你給我一枚香蕉並寄予從愛心發出的同情，那我就永遠感謝你；可是你給我十億美元，而同時當衆掌摑我，那我就會對你說：「滾蛋！」儘管這可能意味着我的死亡。

印尼人習於感情用事。我們是世界上唯一具有一種專用來摟抱的枕頭的民族。在每個印尼人的床上，有一個

用來墊頭的枕頭和一個長而圓的枕狀物——叫做 Guling（抱枕）。我們需要 Guling 的唯一理由，就是爲了能通宵擁抱着它。

當我感到人們對我友好、同情、諒解、與愛戴時，我就成了世界上最可親的人。儘管這一切未用言語來表示，我仍然可以感受得到。同樣，不滿的情緒，即使沒有吐露，我也能感受得到。對這兩種情況，我的反應是本能的。有一位英國的高級外交官至今還是不知道，打開蘇加諾心房的秘訣是愛。在最近一封寄給唐寧街十號的信中，他寫道：「蘇加諾總統是不可控制、不可預測、不可約束的人。他好像一只被逼得走投無路的老鼠。」

對於一位把整個生命貢獻給自己祖國的人；對於爲了堅持理想而入獄和流放達十三年多的人，這是很妙的稱呼。也許在許多問題上我們彼此的看法不完全一樣，但他就能稱我爲一只老鼠？當這封信落在我手中時，我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最後，他在信裏說：「我將千方百計使蘇加諾得到『報界最壞的評論』。」

在這六年中，我沒有好好睡過。我就是無法安眠。有時，深夜裏，我打電話給某個親近的人，譬如我的第一副總理蘇班特里約（Subandrio），我說：「班特里約，過來跟我坐坐吧，陪着我，跟我聊聊天吧，講講一些笑話吧，只要不是政治，甚麼話都可以說。如果我睡着了，那麼請你原諒。」我通宵看書，通宵思想，每天早晨五時就起床。我頭一次服食了安眠藥，我真累，累死了。

我不是一個沒有過失的人，每一個人都會犯錯誤。在某些宗教節日裏，我常當衆請我的人民原諒那些我自己知道的或不知道的過失。我的缺點之一也許就是經常追求理想而不重視冷酷的現實。我不斷地企圖征服和改變環境，利用它來達到我所追求的理想。結果是：我雖然辛辛苦苦爲民服務，最後我還是受到惡毒的攻擊。

人們問：「蘇加諾，如果有人批評你，你難過嗎？」那是當然的啦。我不喜歡被人指責。我也不像別人一樣是個人嗎？即使是一個國家元首，你切傷他的身體，流出來的還是血。是的，我喜歡人們愛我，我有自我意識，

這我承認。但是一個沒有自我意識的人，決不能把千島萬海統一成一個國家。我愛虛榮，然而誰不愛呢？那一個人不喜歡被人贊揚呢？

記得有一天，我接到了兩份關於我本身的自相矛盾的報導。有時，一個行政首長會覺得不知相信那一個好。一份是「展望周刊（Look Magazine）」登載的。這家周刊宣稱：印尼人民都反對我。在他們所發表的文章中，他們引用了一個三輪車夫的話——三輪車夫在我國的地位相當於國外的計程汽車的司機——據說，這位三輪車夫說：印度尼西亞形勢非常可怕，連農民現在也厭惡蘇加諾了。

我看完這篇文章是下午五點鐘。同平時一樣，我正準備在總統府的花園裏作半小時的散步——這幾乎是我唯一的運動。其時一位張惶失措的警官被引了進來。我一邊散步，一邊請他告訴我甚麼事情要報告？

「Bapak，這……基本上是好消息。」他開始說。——「Bapak」或「Pak」的意思是父親，是人民對我的愛稱。

「你說基本上是好消息的意思是甚麼呢？」我問。

「這個，這個……」他說，「人民很擁護您，他們熱愛您，特別是平民。我知道，因我剛目睹他們對您表示的尊敬。」說到這裏他停了。

「說下去。」我勸他。「說給我聽，你從那兒來，看見過誰，他們做些甚麼？」

「是這樣，Pak」他開始說。「我們所管轄的地區包括有妓女區。我們定期到那兒檢查，因為我們的任務是經常監視她們。昨天有一個警察小組去視察。您知道他們發現了甚麼？他們發現了您的畫像，就在那兒，在牆上。」

「把我掛在那兒？」我問他。

「掛在每一個房間裏。每個房間當然有一張床。每張床邊有一張桌子，正好在那桌子上面的牆上——就是您。您俯瞰着在那兒做出的事情。」

他緊張地看我一眼，等待我的指示。「人民愛戴您，我們都感到高興，可是我們的總統從牆上目睹着這一切，是否妥當，我們深感惶惑。怎麼辦？我們是否可以把您的像片從牆上挪開？」

「不，絕對不，」我說：「就讓我在那兒吧，讓我這副衰老而昏花的眼睛瞧着吧！」

目前沒有一個人像蘇加諾那樣能引起各種互相矛盾的感情——我一方面像惡棍似的被人詛咒，另一方面又像神一般被人崇拜。

年老的人不辭跋涉，只爲了在逝世以前能謁見一次 Bagak，並不是罕事。一位老漁民，並非爲了要求任何恩惠，而是僅僅爲了要在我面前跪拜，吻我的腳，竟然徒步走了二十三天。他說，自己許過願，逝世之前，要親眼看見他的總統，並要表明自己對總統的熱愛和忠誠。

很多人相信我是神，具有超自然的醫療能力。有一位椰園農夫，他的兒子患了重病，一天晚上他作了個夢，他必須到我的所在，爲兒子討取一些水——廚房裏普通的自來水。他相信我親手取的水，具有醫藥的性能。我不能駁他，因爲爪哇人是迷信鬼神的。而且他深信：如果沒得到我親手給予的水，他的孩子一定會死去。我把水給了他。一個星期後，那孩子果然痊愈了。

我經常定時地到祖國各地視察，從蘇門答臘最北的沙橫(Sabang)直到西伊里安最東的馬老奇(Merauke)。幾年前我訪問了中爪哇的一個小村莊。有一位農村婦女走近我的侍從，小聲地對他說：「請不要把總統用過的碟子拿去，請把他喫剩下來的東西都給我。我懷孕了。希望生個男孩。希望他像 Bagak。因此請讓我吃些總統親自接觸過的食物。」

在巴厘島，人們相信蘇加諾是印度教中的雨神憐思奴（Vishnu）的化身。因為每逢我來到峇塘（Den Pasar）首府郊外的小別墅——它是專為我自己而設計和建築的——即使在乾燥的季節裏，也會有雨下降。巴厘人確信我會給他們帶來福祉。我最後一次飛到巴厘時，他們正遭到旱災。我一到，雨就嘩啦啦地下了。

坦白地說，當我逗留在丹巴西齊（Tampak Siring）時，逢到下雨，我不禁感謝真主；因為不然的話，我的威望將會受到損害。

但是全世界的人只能讀到一個有關三輪車夫的文章，他們只知道蘇加諾不是經濟學家。對了，我不是經濟學家。難道肯尼迪或約翰遜是嗎？難道某一家西方雜誌就可以此為根據而報導我的國家經濟就要崩潰了嗎？或以此為根據而說我的國家是「腐朽的國家」，或寫出標題為：「讓我們對蘇加諾採取行動吧」為頭條新聞的文章？

如果新聞記者不喜歡日本或菲律賓，他們可能報導：那兒有些地區，往往全家老少因饑餓而自殺。這是衆所周知的慣技。但他們不那樣做。祇有關於「亞洲的壞蛋」，他們會登載了因遇到旱災和颶災而造成的糧荒的難民的圖片。這圖片背景是我那壯麗的新旅店，同時加上標題：「蘇加諾的印度尼西亞。」

但是這決不是蘇加諾的印度尼西亞。蘇加諾的印度尼西亞現在可以自豪地宣稱：四十五歲以下的人已經百分之百地認識文字。二十年以前，當我們的國家剛宣佈獨立時，識字的人只有百分之六。蘇加諾的印度尼西亞民族現在比早一代的人高了兩吋。難道挨餓的孩子會發育健全嗎？

但是新聞記者仍然寫着我：「莫斯科的僕從。」讓我們斷然把這件事糾正過來。我不是、我從未，我也不能成為共產黨人。我向莫斯科低頭嗎？任何曾經接近蘇加諾的人都知道，他的自我意識之深，不可能使他充當任何人的僕從，除了做他自己的人民的僕從。但是新聞記者沒有登載蘇加諾的優點，他們只寫出蘇加諾的錯誤方面。

他們喜歡對照地刊載豪華的印度尼西亞酒店和貧民區的圖片。這位「金錢浪費者」建築該酒店的唯一理由是爲了吸引用別的途徑不能得到的外國資金。這酒店開業後第一年所得是兩百萬美元。我知道這酒店附近有貧民區；可是連世界上最富裕國家，雖有那些華麗的花木青蔥的價值百萬美元的旅店，但一轉彎就是些醜陋的，堆積着垃圾、破爛而腐敗的建築物。我看見他們的豪富坐着光彩奪目的轎車；但是我也看見不幸的人們爬在垃圾箱上揀拾番薯皮。世界上各大城市裏都有貧民區，不只是在蘇加諾的雅加達。

西方國家經常指責我對社會主義國家過於親近了。「哦」他們說：「瞧，蘇加諾又靠攏東方集團了。」請問怎麼不可以呢？俄國人從來不允許任何人在文章中嘲弄我。中國人常常讚揚蘇加諾，他們從未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使我窘迫。他們從未在公衆面前把我當作縱壞了的孩子，如果不乖，就不給糖果吃。人民中國經常希望贏取蘇加諾的歡心。赫魯曉夫每兩週寄給我果醬和果子凍，也寄給我他收穫中最精選的蘋果、玉米和其他蔬菜。那麼，我感激他們難道是錯誤嗎？對那些待你和善的人，你能不和善相待嗎？對了，我會經試行中立政策。但是誰內心中能够責怪我，如果我說：「東方的人民，感謝你們一向對我表示的友誼，感謝你們不傷害我的感情。感謝你們，因爲你們對自己人民說了蘇加諾至少爲他的祖國做了他可能做的一切；感謝你們的禮物。」我所表示的是謝忱——不是共產主義。

我在很多事情上被責難。我的敵人常常這樣發問：他爲甚麼這樣經常出國旅行呢？一九六〇年六月，我到印度、匈牙利、奧地利、阿聯、畿內亞、突尼斯、摩洛哥、葡萄牙、古巴、波多黎各、舊金山、夏威夷和日本進行兩個月零四天的訪問，以後，有人告訴我一句特地爲我製造的話，即：「有了七〇七型飛機，就要旅行」。這句話的含意是甚麼，若非一位美國朋友告訴我，我一點也不知道。不錯，我是出國訪問最多的總統。我甚麼地方都到過，只除了倫敦，雖然英女王已經兩次邀請我。我希望有一天能接受她的招待。

我出國訪問是有原因的。我希望全世界知道印尼。我希望世界人民能認識印尼人的相貌；親眼看見我們已不是像荷蘭人常常稱呼的「愚昧的小青蛙」民族；也不是像他們所一貫稱呼的「只配被吐唾的愚蠢的土人」；也不再是身穿着紗籠，頭綁布巾，卑躬屈節，如我們以前的殖民主人要求的那種次等民族了。

從人口來說，我們在世界居第五位，僅次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印度、蘇聯和美國。我們的羣島中有三千個是適於居住的。可是你知道有多少人根本不知道有印度尼西亞的存在嗎？他們知道我們國家的位置嗎？他們知道我們的皮膚是棕色、黑色、黃色，還是白色的？但是有一點是他們肯定知道的；那就是蘇加諾的名字。並且他們也認識蘇加諾的相貌。

許多人們不知道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島嶼國家，也不知道我國幅員達五千里；相當於歐洲大陸從西海岸經過各國直達最遠的東部邊界的距離。他們不知道，僅次於澳洲，我們的國家是世界第六個大國，有二百萬平方英里的版圖。他們一般沒有意識到，我國的位置是居於亞洲和澳洲兩個大陸與太平洋及印度洋兩個海域之間。他們不知道我們生產着世界最好的咖啡，所以有「A Cup of Java」（一杯爪哇咖啡）這樣的說法。他們不知道印尼是東南亞生產石油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生產錫礦佔第二位的國家。他們不知道，從天然富源來說，除了美國與蘇聯以外，我們是世界上最富饒的國家。他們也不知道美國每四個汽車輪胎中，必有一個是印尼橡膠製成的。但是他們卻肯定知道蘇加諾的名字。我的一個外交官員告訴我，蘇加諾的一次訪問，等於一個大使十年的工作。這就是為甚麼我經常出國訪問。為甚麼在地球每個角落演講時，我總是介紹我的國家的情況。我要教導那些外國人，讓他們開開眼界，認識我們那青翠可愛，環繞赤道，宛如碧玉腰帶的祖國。

有一天，我的祕書給我一封僅僅寫着這樣的地址的信：「東南亞、印度尼西亞、蘇加諾總統」。寄信者說，他聽說我不允許出版自由，這話是否確實；如果確實，那我就是一個暴君。寫這封信的人，稱我是暴君。他侮

辱了我，但這沒有關係。你知道甚麼事使我激怒嗎？不是別的，就爲了他以爲郵局連印度尼西亞的位置在那裏都不知道，所以要在地址中加寫了「東南亞」這三個字。

輿論是變化無常的，我一九五六年第一次訪問美國時，那兒的人都喜歡我。現在恰是流行反對蘇加諾的風氣。然而有人趁機從中取利。不久前，有人給我一分美國黃色雜誌。雜誌刊登了半裸的，穿着三角褲的脫衣舞女站在全副軍裝的蘇加諾旁邊。這是兩幅不同照片的合影。看起來像是幅一個脫衣舞女正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面前脫衣的相片。那是兩幅相片疊印的。這是對一位國家元首的醜惡行爲。如果美國這樣對待我，我是否仍然應該喜愛美國？

我把這種手段同我尊敬的肯尼迪總統討論過。肯尼迪與我從初會起就彼此尊重。他說：「蘇加諾總統，我很欽佩您。像我自己一樣，你具有博採周諮的鑽研精神。你讀了各種典籍，你的知識很廣博。」接着他談到了我所提倡的思想，並引用了我演講詞中的某些詞句。肯尼迪富於人情味，和藹可親。我們找到了許多共同點。

肯尼迪對我很熱情和友愛。他把我帶進了他二樓的私人寢室，我們就在那裏會談。

我對他說：「試想，您是否意識到，一方面您本人可能正在鞏固友誼；但另一方面卻有人常嘲笑、諷刺別國的領袖，或者允許貴國的報刊不間斷地非難他們，而破壞了和外國的關係。因爲我們受到這種傷害與激怒，有時不免作出激烈的行動或反應。實際上，國際關係不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更大範圍內的表現嗎？這種不間斷的非難會破壞各國之間的和睦關係，能使貴國與其他國家之間已經够困難的關係，緊張到不必要的程度。」

「我贊成您的看法，總統先生。我自己也受到我們記者的非難。」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但是，幸運的或不幸的是，出版自由是美國傳統的一部份。」

「當阿爾本·巴克萊任美國副總統時，他曾經訪問過我國。」我說：「當一羣美麗的年輕姑娘圍着吻他的那

一天，我正站在他旁邊。」

「我相信巴克萊副總統一定很高興。」肯尼迪笑嘻嘻地說。

「儘管如此，沒有一家印尼報刊會登載這個鏡頭，因為這樣做，他們將使一位政治家在全球感到窘迫。他是一個很樂天的人，可能他不反對他的相片登載在報刊上。但是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我們確信我們有責任保護在我們國土上的世界各國的領袖。」

這件事肯尼迪非常同意，並向我承認說：「你說的完全對，但我能做些甚麼呢？連我自己的祖國也遭到惡罵。」

我回答說：「好，那是你們的社會制度。您在國內遭到惡罵，這是沒有辦法的。可是在我看來，我在您的國家裏必須忍受像你們國家元首所遭受同樣的侮辱，那是不合理的。你們的『時代周刊』和『生活周刊』等雜誌對我尤其卑鄙。請看『時代周刊』寫道：看見一個女人，蘇加諾就無法抑制性慾衝動。他們經常說我的壞話。他們從來沒有報導過我所做的好事。」

肯尼迪總統雖然和我能互相了解，然而我們這小小的和洽範圍，從來不能擴展到美國的新聞界。他們一天又一天，仍然把我描寫成一個現代唐璜。

是的，是的，是的，我愛女人。是，我承認。但我不是像他們所說的那種花花公子。在東京我和幾位朋友到過藝妓院。藝妓院裏沒有任何不道德的事。你只是坐一坐，進餐，聊天和聽聽音樂。只有這些。但是西方的期刊卻把它誇張到我幾乎是一個專門誘惑婦女的大壞蛋。

沒有這些小小的享受，我活不下去。我熱愛生活。訪問過我的外國人都說，我有個「愉快之宮」。我的副官們個個滿面春風。我與他們開玩笑，同他們唱歌。如果不是我間或有些娛樂，有些歌唱，有些小小的消遣，我將

被生活壓碎。我已經六十四歲。當總統是使人易老的職業。人變老，這件事看來對任何人都不利吧。因此，爲了生存，有時我必須逃避一下。

我被剝奪了許多普通人所能享受的歡娛，比方說，我自小就已經騎腳踏車行遍了我的故鄉爪哇。現在，我也無法騎腳踏車了，否則會有成千成萬的人民跟着來。在好萊塢時，我應邀參觀電影製片廠。當我離開該廠時，遇見了一個發信的小孩騎着腳踏車經過，接着，他把車子暫時停放在那裏。我當時正興致勃勃，因此我就騎着它馳騁。我並不打算給人以任何印象。我僅僅是感到快活。但是關於這件事的消息和圖片卻傳遍了全世界。在我自己的祖國我是再也不能享受最使我感到歡樂的事了，那就是到工藝品商店中觀看珍貴的藝術品，並與店員們討價還價。我每到一個地方，人民就蜂擁而來。

醫生說過，快樂對我的健康極其重要。快樂能使我暫時逃避我自己和我的監獄。因爲我的生活正像坐獄一般。一座監獄，繁文縟節的監獄，規行矩步的監獄。

爲了逃出這種監獄，每個人必須做些事。阿尤汗打高爾夫球，肯尼迪航海去，西哈努克親王作曲，泰國皇帝奏薩克管，林敦·約翰遜飼養家禽。我也需要娛樂。因此，每當我去旅行時，我容許我自己去追求愉快。根據美國的憲法，每個人都具有這種權利。

當總統不能不使人感到寂寞。使一個人有可能成爲總統的性格，也就是使自己能隔絕於人的性格。然而，對旁人來說，我是一個興致勃勃的人。我的這種個性使我即或遭遇極大的不幸也從不顯露於形色。儘管我異常痛苦，可不會有人發覺的。蘇加諾不是因其「微笑」而著名嗎？不管面對着甚麼問題——馬來西亞問題也好，克服貧困的問題也好，謀害我的性命問題也好——蘇加諾從外表看來總是快活的人。

我常獨個兒在 Istana Merdeka (自由宮) 的遊廊裏閑坐着。Istana 是「宮殿」的意思，Merdeka 是「自由」

的意思。這座遊廊不很壯麗，半蓋着遮篷來遮擋陽光和熱氣。裏面的傢俱僅僅是幾條沒有布套、沒有油漆的籐椅和幾張用我國手藝製成的 *Batik*（花布）鋪蓋的籐桌。唯一符合我崇高身份的東西，就是一張孤獨而上面有椅墊的椅子。它叫做「總統席」。我就在那裏坐着，凝視着美麗的，安靜的，我親手栽培的花園。我內心孤寂萬分。

我喜歡與人民共處，這可說是我的天性。可是我現在無法這樣做了。我常常因為不能出去同我的人民——孕育我的老百姓——相處而感到窒息，好像呼吸即將停止。

有時我變成了像拉西德（*Harun Al Rashid*）一樣，獨自乘着汽車環遊市內，只有一位充當司機的穿便服的副官伴隨着我。有時我覺得，必須暫時擺脫國事的糾纏去探測我國脈搏的跳動。這些國事常常像我的影子一般跟隨着我，我無法避開它。我無從擺脫它的掌握。我無從遠離它們。這些國事像一個巨大惡魔永遠追趕着我。

一套制服和一頂 *Pithi*（黑絨帽）構成了我的商標。但是，有時在深夜裏，我只穿着拖鞋和長褲。在天氣炎熱的時候，我只穿一件背心。換了衣服，再戴上一副潤邊眼鏡，我的樣子就完全變了。這樣，我就可以上街溜達而沒有人認識我了，事實也正是如此。我這樣做是因為我必須看看生活。我是人民的一份子，我必須看見他們，聽他們說話，同他們接觸。當我混在人民中間的時候，那是再快樂也沒有了。他們是我生命中的營養。

我傾聽他們的談話。我聽他們爭吵，講笑，談情說愛。我感覺到他們的活力湧進我的身體。

我們乘一輛很小的沒有標記的汽車出去。有時我停下車來買些路邊販賣的沙爹。沙爹是一種把肉串在一枝細竹棒上，在火上烤來喫的食品。我獨自坐在路邊，吃着那裏在芭蕉葉裏的美點。這才是我享受幸福的時間。

我的人民只在聽到我的聲音時，才能認識我。一聽到我的聲音，他們即刻認出了我。一天晚上，我同我的侍衛長祕密地去到雅加達的賽尼火車站。我徘徊在人民中間，沒有一個人注意我。最後，因為我很想和他們交談，我對一個男子說：「你在這裏堆積的磚塊和建築材料是運到那裏去的？」

他還來不及回答，就聽到了一個喊聲。「嗨」，一個女人叫道：「那不是 Bagak 的聲音嗎？……是的……Bagak 的聲音……」嗨，大家看，那是 Bagak……是 Bagak……」眨眼間，我被人羣圍住了。我的侍衛長迅速地把我拉開，推進小汽車，馬上離開了該地。

總的來說，總統職位猶如單人牢房。我有幾位朋友。不多。變了的往往是別人的態度，而不是你的態度。他們對你另眼相看。他們幫助着把你的周圍變成一個枯寂的孤島。因此當我能離開這個牢房時，我就要設法享受一下。在東京，我到國際劇場去看戲。那裏的舞台可以一次演出四百個漂亮的少女。一九六三年，我聽說我的駐日大使從未到過這個地方，我就責備他說：「喂，班邦·蘇根（Bandung Sugeng），你不是個好大使。一位外交家必須嘗試他駐在國的每一種生活的滋味。來吧，咱們看看女孩子去。」

我還邀請了一位假道學的印尼人。當他的總統談論女人時，他會大驚小怪。這個人跟那裏所有的美女眉來目去一頓以後，接着站起來說：「我再看不下去了，我得走了。我太受刺激了。」他是偽君子。我厭惡一切作偽。

當然，有時候我的名聲也往往因為環境而受損害。一九六四年正月，我到菲律賓去時，施奧斯達多·麥卡帕格總統到機場迎接我。他親自陪同到我駐蹕的勞勒斯（Laurels）大廈去。那裏的主人是前任菲律賓總統勞勒斯先生，他的夫人及他的子孫，爲了使我的訪問更多采多姿，他們爲我安排了他們的巴雅尼漢文工團演出印度尼西亞的連索舞（Lento）來歡迎我。兩個年青女子走出她們的隊伍，前來邀我參加跳舞。任何人都很難拒絕這種邀請，於是，我就開始跳舞了，但是……噤的鎂光一闪，快門一開，報上的大標題出現了：瞧，蘇加諾，又在追女人。我喜歡動人的少女聚集我的周圍，因爲我覺得她們像鮮花一樣，而我喜歡凝視着鮮花。一九四六年，正當革命的恐怖時期中，我的第二祕書的妻子，每天早上專門被請來爲我打早餐中的雞蛋。其實我自己可以打這些雞蛋的，但是我的夫人從來不習慣那麼早起身，而在面臨着緊張的情況，如果在我的周圍可以看到笑容滿面的人，我